

高芮森 编

外国著名喜剧选



河南人民出版社

序

廖可兑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外国著名喜剧选》是经过精心选编的一部好书。它所收进的六部喜剧，即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莫里哀的《伪君子》、哥尔多尼的《女店主》、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礼》、格里鲍耶多夫的《聪明误》和果戈理的《钦差大臣》，都是欧洲戏剧史上的名剧，迄今在世界各国仍然保持着它们的舞台生命力，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下面，我对这六个喜剧分别作点简短的介绍：

《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亚（1564——1616）的早期喜剧，大约写于1597年。作为年轻的人文主义剧作家——莎士比亚是满怀喜悦心情和乐观主义思想面对现实生活的。因此，在这一时期，他虽然写了一系列历史剧和几部悲剧，但是喜剧创作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这些喜剧都是以怡情悦目的故事情节，积极有为的人物性格，充满诗意的戏剧语言，引人入胜的轻歌漫舞，令人捧腹的插科打诨和轻松愉快的喜剧气氛等等，展现着各式各样彩色缤纷的生活图景，给人们带来无与伦比的美的享受。当然，这些喜剧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各种社会生活问题；不过相形之下，这些问题就显得不那么严重了。这一切，我们在《威尼斯商人》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知道，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题材大都是从各种历史、神话以及故事传说中借用过来的。《威尼斯商人》的故事情节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关于一磅肉的契约故事；另一个是关于采用三个匣子选婚的故事。莎士比亚巧妙地将这两个故事组织在一起，构成他的喜剧的中心内容，从而把它写成一部具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因素相结合的艺术特色的作品，这也充分显示了他的戏剧创作才华。

和一般的人文主义作家一样，莎士比亚认为友谊和爱情对于人类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在《威尼斯商人》中，他更是把友谊和爱情作为创作主题来加以赞美的。毫无疑问威尼斯的商人安东尼奥就是友谊的化身。他放债不取利息，乐于资助朋友。为了帮助巴散尼奥娶鲍细霞为妻，他还不惜以到期不能还债便割他一磅肉为条件向他的仇人夏洛克借贷一笔钱。安东尼奥是个基督徒，夏洛克是个放高利贷并视钱如命的犹太人。在他们之间，不仅存在着商业上的矛盾冲突，而且还有民族仇恨。对于夏洛克的重利盘剥的行当，他的吝啬性格，特别是他利用一磅肉的契约进行复仇的残酷行为，莎士比亚是加以无情鞭挞的。对于安东尼奥尊重友谊和鄙视见利忘义之徒的情操，莎士比亚则是加以热情称赞的。但是在对待夏洛克的態度上，安东尼奥也暴露了他的种族偏见。莎士比亚对此采取了否定立场。这表明莎士比亚在种族问题上超过了当时一般英国人的思想偏见。

安东尼奥和夏洛克之间的矛盾冲突是整个剧情的一条主要行动线索；巴散尼奥向鲍细霞求婚的活动则是它的另一条主要线索。莎士比亚让这两条线索交织起来，互相作用，一同向前发展，以一方面的矛盾冲突的解决来解决另一方面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解决了其它的问题。巴散尼奥从三个分别以金、银、铅制作

的匣子当中，选定了铅制的匣子，结果取得了求婚的胜利。这一胜利使巴散尼奥赢得了一个聪明美丽的妻子，也给安东尼奥带来了一个博学多才的律师。鲍细霞在法庭上将夏洛克从要求割下安东尼奥一磅肉的原告地位推到企图谋杀人命的被告地位，使他的复仇行动归于失败，并受到法律的惩处，整个剧情发展至此便达到了高潮。

喜剧是以三对青年男女的美满姻缘告结束的。这是对于爱情的歌颂。主持法庭审判的公爵最后宣布免去夏洛克的死刑，安东尼奥也要求对他从宽处理，这都是为了宣扬“基督精神”。在友谊和爱情这两大主题中，莎士比亚更重视的是前一个主题。

《伪君子》又名《达尔杜弗或者骗子》（1664——1669），是莫里哀的代表作，也是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喜剧的代表作。

古典主义规定有一套严格的创作法则，诸如遵守三一律，悲剧和喜剧不能混在一起，诗的语言等等。这些创作法则主要是对悲剧创作的要求，喜剧创作则比较自由。古典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十七世纪法国的合理主义，而合理主义的最高准则是拥护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王权政治。在这一政治原则的指导下，古典主义戏剧特别重视艺术的单纯性、精练性和明确性。《伪君子》基本上是符合这一要求的。

莫里哀的思想立场是很明确的：主张王权政治，反对封建僧侣和贵族阶级，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爱护下层人民。《伪君子》的主题是揭露封建僧侣阶级的伪善；它的主人公达尔杜弗是欧洲戏剧史上最著名的一个典型的伪君子。从他的虚伪的生活作风和思想作风中，人们看到他贪财好色的丑恶嘴脸。他以极其狡猾的手段骗取了奥尔贡的信任和崇拜，呆在奥尔贡家里养尊处优，为所欲为，甚至调戏他的妻子。事情败露之后，这个恶棍还企图利

用奥尔贡的不可告人的事件进行诬告陷害，以便达到他谋财害命的罪恶目的。幸赖贤明的国王进行干预，把他从原告地位推到被告地位，并将他治罪；奥尔贡一家人才得以转危为安，否则他们就会落到家破人亡的地步。剧本以达尔杜弗被捕入狱，奥尔贡被宣判无罪告终，从而形成了一个惩恶扬善的喜剧结局。莫里哀在这里也对法王路易十四进行了热情的歌颂。

莫里哀作品中的人物性格比较单纯。达尔杜弗的性格只是伪善。正因为如此，这个伪善性格就被刻画得更有深度。在五幕剧中，他要到第三幕第二场才第一次出场亮相，这种表现方法也显示了莫里哀的创作才能。事实上，达尔杜弗的伪善性格在这以前就被其他的剧中人物揭露出来，莫里哀只是让他出场后用他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人们对他的揭露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他的戏不多，但是他是惯于用行动讲话的，他每次出场都在用最卑鄙的行动暴露他自己，这样就非常具体地把这个十恶不赦的伪君子形象展现在人们面前了。

达尔杜弗是莫里哀鞭挞的唯一对象，奥尔贡以及他的母亲由于宗教迷信思想而产生的愚蠢行为也遭到他的批评；但是这是善意的批评，他企图通过他们受骗上当的事实教育资产阶级的人们警惕宗教骗子的愚弄。奥尔贡家里的其他成员，包括女仆道丽娜在内，都是反对达尔杜弗的。特别是道丽娜这个人物，莫里哀对她作了最热情的称赞。她聪明机智，乐于助人，疾恶如仇，敢于斗争，无论是在反对达尔杜弗或者反对奥尔贡的活动中，她都是站在最前列的。从对待这个仆人的态度上，我们可以看到莫里哀热爱下层人民的深厚感情。道丽娜是《伪君子》中最富于现实性、最生动有力和最富有血有肉的人物，也是莫里哀塑造的一个最有代表意义的女仆形象。

《伪君子》是一部严肃喜剧，评论家们称之为高级喜剧。但在这部喜剧里面，莫里哀喜欢运用的闹剧手法仍然有所表现。为了让奥尔贡相信达尔杜弗确实对她有邪恶念头，奥尔贡的妻子便将他藏在桌子底下，使他亲耳听到达尔杜弗是如何对她“谈情说爱”的。这就是一个著名的闹剧场面。这个场面滑稽可笑，但丝毫不影响剧本的思想内容。相反地，它在剧本里还占有重要地位，喜剧情节被它推到了高潮。

《伪君子》的戏剧情节也比较单纯。在揭露宗教伪善的主题下，整个剧情沿着单一的动作线向前发展，不存在离题的插曲，也没有无关重要或可有可无的生活事件，直到第四幕第七场达到高潮。在高潮下降的过程中，经过两次“突变”（达尔杜弗被奥尔贡赶走和他最后被捕入狱），剧本就宣告结束了。剧本的结构形式是非常紧凑和完整的。

《女店主》（1753）是意大利启蒙戏剧创始人哥尔多尼（1707—1793）的戏剧创作的最高成就，也是十八世纪意大利戏剧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哥尔多尼是著名的戏剧改革家。他是在改革阻碍当时意大利戏剧发展的即兴喜剧的基础上创造出他的启蒙时期现实主义戏剧的。为了进行戏剧改革工作，他自己也写即兴喜剧。我们所熟悉的《一仆二主》（1749）原来就是他写的一部即兴喜剧。把这个剧本和《女店主》作一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出，《女店主》的文学价值远不是《一仆二主》所可企及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十八世纪意大利不曾产生象法国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礼》那样具有革命意义的戏剧；但是《女店主》在欧洲启蒙戏剧当中却占有重要地位。它首先是一部对意大利第三等级进行启蒙教育的好教材，同时对于欧洲各国的戏剧也产生了

一定的影响。通过女店主米兰多琳娜这个女主人公，哥尔多尼主要是教导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应该怎样生活，怎样待人接物，怎样同封建贵族作斗争，怎样维护他们自己的权利和尊严。

这部喜剧反映了十八世纪意大利两个阶级的发展趋势和力量对比：封建贵族阶级仍旧居于统治地位，但是已经走向衰落；资产阶级正在兴起，但是还显得比较软弱。作为启蒙思想家和戏剧家，哥尔多尼是把振兴祖国的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青年一代身上的。因此，他对于年轻的女店主进行了充满诗意的描绘和无限深情的赞美。她独立自主，热爱劳动，聪明机智，和蔼可亲，注重礼节，不卑不亢，对于自己的业务十分珍视并善于经营。在他看来，婚姻必须建立在自由选择 and 男女平等的基础上，双方应该以诚相待，互相帮助，而不应该重视阶级出身、社会地位或个人财产。她对于那些朝三暮四的放荡贵族嗤之以鼻，必要时也和他们作无伤大雅的周旋，甚至加以嘲弄。她完全是按照启蒙思想的要求处理生活问题的。

一般说来，启蒙时期的人物性格具有一定的抽象性。米兰多琳娜以及生活在她周围的人们却都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女店主》是一部充满生活气息的作品，其中除了女店主以外，还有四个比较重要的人物：一个侯爵、一个伯爵、一个骑士以及米兰多琳娜的一个心腹仆人。侯爵是世袭贵族，已经陷于贫困；伯爵富有，爵位却是买来的。他们一个以地位而另一个以财产来竞相追逐米兰多琳娜，骑士则表示他从来不爱女人。充满自信心的女主人公以不同的方式将他们一个个捉弄一番以后，便和她的心腹仆人结婚了。相形之下，这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封建贵族显得特别愚蠢可笑，在较量中完全不是米兰多琳娜的对手。在十八世纪的意大利，这类腐朽的封建贵族到处都有，资产阶级要把

他们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还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这是个现实问题，也是使哥尔多尼深感不安的问题，因此他对于这个问题也如实地作了多方面的反映。在《女店主》里面，不仅有旧贵族和新贵族，同时还有假贵族，这就说明封建贵族势力是不容忽视的。哥尔多尼反映那两个冒充贵妇人的女演员在社会上进行招摇撞骗的行为，实际上是对于封建贵族势力的揭露和讽刺。

和一般的启蒙时期现实主义作家一样，哥尔多尼是强调戏剧艺术的社会教育作用的。他认为古典主义三一律妨碍创作自由并容易损害戏剧艺术的真实性，必须加以废除。他推崇当时比较先进的法国戏剧，但是反对对它的模仿或抄袭，要求戏剧必须反映现实生活，具有民族特征。他曾经主张以性格喜剧代替即兴喜剧，但是象莫里哀的那种只表现单一的人物性格的作法，也不足取，人物性格应该还是比较复杂的。这一切，在《女店主》中都得到具体反映。《女店主》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都比《伪君子》的复杂。《伪君子》是古典主义的性格喜剧，《女店主》则是启蒙时期现实主义的风俗喜剧。

在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推动下，法国的启蒙戏剧一直在向前发展，到了资产阶级革命（1789——1794）临近之前，《费加罗的婚姻》这部著名的政治喜剧诞生了。

《费加罗的婚姻》是博马舍（1732——1799）写的一个三部曲（《塞维勒的理发匠》、《费加罗的婚姻》和《有罪的母亲》）中最重要的一部喜剧，写于1778年，但是立即遭到禁演。莫里哀的《伪君子》曾经被禁演五年，《费加罗的婚姻》被禁演的时间更长，它要到1784年才得以正式上演。在这六年当中，博马舍想方设法争取法国政府开禁，但是法王路易十六意识到这个剧本的

危险性，决心不让它同广大的法国观众见面。他说过，如果他让《费加罗的婚姻》上演，那就无异于破坏巴士底监狱。后来拿破仑进一步指出，法国大革命的行动是从《费加罗的婚姻》第一次上演的那一天开始的。

的确，《费加罗的婚姻》具有鲜明的革命主题。它反映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风暴即将来临之势，愤怒的法国人民正在为反动的封建王朝敲丧钟。路易十六企图把剧本扼杀在摇篮里，但是革命形势越来越使他惊惶失措，他的这一罪恶目的终于未能达到。

《费加罗的婚姻》是在法国启蒙戏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革命戏剧。它的创作内容超出了一般启蒙戏剧的水平，表现形式也有它自己的艺术特色。它又名《狂欢的一日》。在这一天当中，机智勇敢的费加罗同他的主人阿勒玛维华伯爵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荒淫无耻的主人妄图利用早已被废除的封建特权夺走费加罗的未婚妻苏珊娜，但是经过一系列的矛盾斗争，在人们的大力帮助下，费加罗终于战胜了伯爵，使他的邪恶意图归于失败，最后在一片欢乐歌舞的热烈气氛中宣告和苏珊娜结婚。这是喜剧的结局。它预示着法国革命人民战胜封建统治后的幸福生活的到来。

如果说，伯爵是法国封建贵族的代表人物，那么费加罗则是法国第三等级的代言人和反封建的英雄。他富有生活知识和斗争经验，对于腐朽的封建贵族采取蔑视态度，并在嘻笑怒骂的言行中尽情地抨击了他们的反动统治。在剧本的最后一幕中，他有一段著名的独白，其中对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法律的欺骗性以及书报检查制度等等，都进行了大胆的揭发和有力的批判。他说：“只要我的作品不谈政府，不谈宗教，不谈政治，不谈道德，不谈要人，不谈有势力的党派，不谈剧场，不谈别的游艺，

不谈有面子的人，经过两三位检查员审查过以后，我可以自由付印一切作品。”象这样无所畏惧地攻击统治阶级的言论，自古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以后，在欧洲戏剧史上是很少见到的。

《费加罗的婚姻》反映了严肃的带有迫切性质的政治社会问题；总的说来，它却始终保持着轻松愉快的气氛和生动活泼的情调。喜剧主人公在斗争中有时也不免陷入困境，眼看就要出问题，但是他凭着自己的应变能力，利用群众的力量和敌人众叛亲离的处境，总能渡过难关；而敌人则一次又一次遭到他的愚弄，无法售其奸。博马舍是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具有高度的戏剧创作才华。他满怀革命激情塑造了费加罗这个仆人形象，着意为他设置许多喜剧情境，以显示他的智慧和力量。他是剧本的喜剧活力的主要源泉，在他身上也反映出作者对于革命的乐观主义态度。

《费加罗的婚姻》的故事情节发生在一天以内，地点基本上在一个地方，但是场景有许多变化，至于故事情节的复杂性，那是古典主义戏剧所不能比拟的。剧本有许多插曲，因此组织结构不象古典主义喜剧那么紧凑。它的那些迅速多变的戏剧动作，接二连三的矛盾冲突，各种计谋喜剧、情节剧和闹剧的因素，短兵相接的斗争场面，长篇大论的独白，大量的抒情歌唱、兴高彩烈的舞蹈动作，各色人等的群众场面，极具讽刺意味的法庭诉讼以及火花四射的戏剧语言等等，使一部政治喜剧显得有声有色，多彩多姿，具有高度的艺术魅力。

《聪明误》又名《智慧的痛苦》，是俄国作家格里鲍耶多夫（1795——1829）于1824年完成的一部四幕喜剧。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欧洲各国已产生了浪漫主义运动，但是《聪明误》基本上是根据古典主义三一律的要求写成的。历来的

评论家对于《聪明误》的诗的语言是非常称赞的。它语言流畅，生动活泼，颇富于形象性和表现力。当然，剧本的最大成就并不在于它的表现形式，而在于它具有现实主义的生活内容和思想内容。

《聪明误》是一部严肃喜剧。它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俄国的封建农奴制及其产生的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和伦理道德等各方面的問題。关于青年男女的爱情问题，在剧本里也有所反映；但是格里鲍耶多夫着力描写和讽刺的是各种丑恶的社会现象。在他的笔下，那些封建贵族，有着各自不同的性格特征。总的说来，俄国封建贵族阶级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在他们身上都打下了鲜明的印记。从表面上看，他们仍旧有权有势，过着优裕的生活；实质上，他们愚昧无知，腐化堕落，是没有前途的。

在这些人物当中，法穆索夫是最有代表性的。他是一名政府官员和封建农奴制的忠实捍卫者。在他的心目中，一个人的价值是以他所拥有的奴隶数目决定的。他过着饱食终日的官僚生活，认为工作的责任只是签字。他在组织上只任用自己的亲属，对待下人粗暴横蛮，对外国盲目崇拜，视知识为瘟疫，把自由思想看成祸害，头脑简单而又爱虚荣，生活趣味庸俗不堪。按照封建传统，他要求青年人把他奉为表率。

在法穆索夫周围或和他有交往的人中间，还有反动军官斯卡洛茹勃，善于向上司献殷勤的秘书莫尔恰林以及不学无术和不务正业的列彼季洛夫等人。和这些人物性格相对立的青年人恰茨基则是格里鲍耶多夫热情称赞的对象。他虽然生长在莫斯科的上流社会；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长途旅行，他接受了进步的思想教育，和法穆索夫等人在政治思想和个人生活要求方面产生了不可逾越的鸿沟。两相对照，恰茨基反对封建统治的自由思想和爱国

热情就显得特别突出。他决不当统治阶级的奴才，鄙视各种追求高官厚禄和个人财富的卑劣行为，憎恨封建贵族社会的一切丑恶现象。为了对祖国作出自己的贡献，他努力追求知识，钻研学问，并希望在崇高的艺术创作事业上取得成功。事实上，他已经把自己锻炼成很好的作家和翻译家。他主张向国外学习，但是反对盲目崇拜外国。

从恰茨基身上，人们看到当时追求进步的俄国青年一代的思想意识和生活要求。这些人是俄国封建农奴制的挖墓人。利用恰茨基追求进步的思想品质，格里鲍耶多夫向俄国人民进行了一次难能可贵的启蒙教育。可惜恰茨基这个人物还缺乏更为积极有为的行动。在整个剧本里面，封建农奴主、各种封建官僚以及形形色色的封建势力，还占有压倒一切的优势。恰茨基最后只是以离开莫斯科并发誓不再回来的行动结束他的这场反封建的斗争的。

《钦差大臣》是俄国作家果戈理（1809——1852）于1835年写的一部五幕喜剧。它标志着十九世纪上半期俄罗斯的现实主义戏剧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果戈理自己说过，他决心在这部喜剧中把他当时看到的俄国所有的坏东西都汇集在一起而尽情地加以嘲笑。他不仅作到了这一点，而且作得很成功。

这部喜剧对于俄国封建社会的丑恶现象的揭露和批判，比起《聪明误》来又前进了一大步。它的故事情节也很简单：一个从首都彼得堡来的年轻人在路上把钱赌尽花光，付不起旅馆费，旅馆老板因此要到衙门去告发他，不料以市长为首的一群官吏却误以为他是一位钦差大臣，毕恭毕敬地接待他，而市长还乐意将女儿许配给他，并以此为荣。这位冒充的钦差大臣尽情地捉弄了这帮愚蠢的官吏以后扬长而去；但是正当市长满以为他将有这么个高贵的女婿因而准备大肆庆祝一番的时候，不仅发现他受了骗，

而且获悉一个真的钦差大臣已经来到市城，剧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结束的。

这是一个具有绝妙讽刺的喜剧结局。真的钦差大臣还不曾露面，以市长为首的政府官吏却一个个吓得呆若木鸡。从这个结局，我们也可以看出，喜剧讽刺的主要对象不是假的钦差大臣赫列斯塔科夫，而是以市长为首的一群政府官吏。通过对这些人物的生活和思想作风的描写，喜剧深刻的揭露了当时俄国封建农奴制度下的官场丑态。

《钦差大臣》的主角，顾名思义，当然是赫列斯塔科夫；但是作为官僚制度的代表人物，市长则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剧本的第一句台词就是他讲的：“诸位，我把你们请到这儿来，是要告诉你们一个很不愉快的消息，钦差大臣要上咱们这儿来了。”这是作者在给剧本点题，更重要的是揭示市长的心理状态以及产生这种心理状态的政治社会根源。

果戈理在为演员提供参考意见的《性格和服装》一文中对市长这个人物作了这样的解释：“市长——长年宦海浮沉，已经变得苍老，他自以为是一个不很愚蠢的人。虽然纳贿，但举止很庄重；样子相当认真；甚至有点喜欢发议论；……他的面貌粗暴而严厉，象每一个从低微的官职好不容易慢慢爬上来的人一样。象大老粗那样，从恐惧转为欢乐，从卑躬屈节转为妄自尊大，在他是很迅速的。”这里从外表到思想作风，都把市长的性格特征概括地勾画出来了。他是个颇有经验的贪官污吏和政治骗子，不满足于市长的职位，梦想着到京城去当一名将军，能够吃到“鲑鱼和香鱼”。可见他误把赫列斯塔科夫当作钦差大臣而对其施展逢迎谄媚的伎俩，决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对于其他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剧中人物，果戈理也作了解释。

作为剧本的主人公，赫列斯塔科夫是我们应该着重研究的对象。果戈理指出：他是个二十三岁左右的年轻人，有点傻，头脑空虚浅薄，言行不加思虑，不能连续不断地集中注意在某个念头上，讲话也不连贯，而且脱口而出，完全出人意外。这些特点都表现得非常突出。他欺骗了市长及其所属的这些愚蠢官吏；但是他不是个职业骗子，他向他们索取钱财也是以借贷为名的。根据他的自白，他有享乐主义的人生观。撒谎对他来说是一种乐趣，他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卑鄙的行为。在果戈理看来，象赫列斯塔科夫的这种性格，在当时的许多俄国人身上都可以找到。

总之，赫列斯塔科夫和市长这两个人物，都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其他的剧中人物也各自有其性格特征，并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生活的这个小城，乃是十九世纪上半期俄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

目 次

序

廖可兑

- | | | | | |
|--------|------------|----|------|-----|
| 威尼斯商人 | 〔英〕莎士比亚著 | …… | 朱生豪译 | 1 |
| 伪君子 | 〔法〕莫里哀著 | …… | 赵少侯译 | 93 |
| 女店主 | 〔意〕哥尔多尼著 | …… | 焦菊隐译 | 177 |
| 费加罗的婚姻 | 〔法〕博马舍著 | …… | 吴达无译 | 279 |
| 聪明误 | 〔俄〕格里鲍耶陀夫著 | … | 朱维之译 | 443 |
| 钦差大臣 | 〔俄〕果戈理著 | …… | 芳信译 | 599 |

威尼斯商人

〔英〕莎士比亚 著

朱 生 豪 译

方 平 校

